

# 1

## 世纪之交中国关于 语言问题的大讨论

2002 年 10 月 15 日

赵俐：2001 年 4 月初我参加博士生招生复试的时候，于老师就问了我关于这次论战的问题。后来，看到网上关于网络语言、外来语等语言问题的争论，我有些感觉到了。

于根元：2000 年底到 2001 年初，好几个语言学家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这一点。2001 年初商务印书馆召开的一次新年茶话会上，我说了这个意思，陈章太、李行健都从不同的角度说了这个意思。2001 年 10 月出版的《网络语言概说》“前言”里，我说：“近几个月来，不少语言学家敏感地提出我们面临着一场关于语言问题的大讨论或者说是大论战。”

大讨论的缘起，比较突出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新词新语整理和研究的深入。那个时候，不少语言学界之外的上层人士有意见。

一是说一些词不文明，例如“泡妞”。二是说不懂了。三是说不对，例如认为“政策倾斜”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一些搞语言学的人也有不同看法。一是认为起初不能认为是规范的。二是要等等看，看优胜劣汰。相关的有追认说。三是认为语言发展不能靠流行语。相关的有新词新语流星说、风说、昙花说。四是认为语言越稳定的越规范，越稳定越是语言的上品。五是认为一个意思有一个词就可以了，例如有了“出租汽车”为什么还要有“的士”，有了“再见”为什么还要有“拜拜”。

讨论的焦点有几个。一是什么是规范。我们提出语言规范的衡量标准是交际值，是交际到位的程度，还提出交际度。我们还不同意追认观，理由是新的语言一开始都是用的人少用的时间短的，不能都认为是非规范的，用的时间长用的人多的也有非规范的，追认观服务不及时，有的词语搞不清时间长短，有的词语我们不希望时间长。我们提出预测观，1995年占了上风。2002年正式改为前瞻跟踪观。1992年在澳门会议上提出语言由两部分组成，而且跟语言规划、跟人联系起来。《网络语言概说》里说了内核外层互补说的文化的根据。

第二个是关于语言的色彩。我们提出新颖理论，提出新颖度。进一步提出什么是语言交际能力，我们认为语言交际能力是同多方面的人实际交际既趋同又趋新不断调整好度的能力。我们认为新颖度是语言创造的标志和衡量标准。由此还发展了语言潜显理论。

我们在收集新词语的时候发现，语言创新跟不规范是共生的。加上中介说，我们进一步认为纯洁语言的说法是不对的。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许嘉璐的主题报告明确提出语言文字不搞纯而又纯。理由是：一是人不纯，二是学习是个过程，三是新的语言现象出来以后又要学习，四是不规范的现象是不断新生的，五是谁来纯洁，六是不纯洁是语言新陈代谢的正常情况。规范是为了提高语言生活的质量，包括语言创新，而不是为了语言纯洁。

此后的大讨论涉及了广告语言和外来词语。

广告词语主要是成语谐音改字。说是误导学生，破坏语言规范和纯洁。有人主张封杀、有人谩骂。

外来词语的讨论声势很大，主要说是洋化、殖民化。

赵俐：回顾一下历史上关于语言问题讨论有过不同的方式：

有以运动的方式来倡导语言新观念的，像“五四”前期的白话文运动、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以及清末到 1949 年的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从文学界开始，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和一个重要部分。有历史贡献，但也有其不足。最大的遗憾是理论探讨不深入。30 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也和别的运动结合在一起，但火药味不那么浓，所以讨论更活跃。国语运动比较成功，原因在于一是发挥了一批权威学者包括语言学家的作用，二是与此相结合，发挥了行政的作用。（参看于根元著《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第一编，书海出版社，1996 年）看来，运动激烈的，语言问题讨论不太深入；语文工作不和重要的、叫得响的事情挂钩，又不好实行。介乎其间的比较好，学术讨论容易活跃和深入，工作又容易实行。这次世纪之交的讨论要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有语言研究者主动用文章形式发起讨论的，比如《语言文字应用》杂志从 1994 年开始连续三年刊登了关于语言观的讨论文章，讨论也很深入。

再就是学术界的实际研究引发的社会上的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比如上个世纪 90 年代之初开始的新词新语冲击波和 2000 年《中国网络语言词典》的编撰所带来的网络语言冲击波。最后还有语言生活实际中的新现象带来的社会各界的不同意见，近来网上关于社会语言，尤其是网络语言和外来词的讨论就是这样的大讨论。这都是世纪之交中国关于语言问题大讨论的一部分。参加的人多了，讨论的介质也多了。

这些讨论具有共同的背景，这就是语言生活实际发生了变化了，

研究者行动了，环境宽松，人们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了，关注语言的人多了。因此，讨论是好事。讨论说明有理论问题没有廓清，有思想方法的问题需要梳理。大讨论是大发展的契机。当然，讨论，难免有些人比较激烈，也有些人缺乏理论依据而且态度还不好，面对这些我们的态度要好。

刘艳春：大讨论之所以发生在世纪之交，有它的客观原因。其中一点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思想得到解放，现阶段思想更是处于一个活跃时期，各门学科都呈现不同程度的繁荣，在语言学领域则主要体现为对语言本质的深入探讨和对语言学学科的冷静思考、重新认识，并形成了各抒己见、积极探讨的局面。

宏观上看，这种探讨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就应用语言学的探讨。具体集中体现在：一、给应用语言学定位，对它的内涵、外延等方面的不同理解进行的论争。二、就应用语言学到底有没有理论的争论。第二是就语言的探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激烈，而且声势也更为浩大。这一探讨由新词新语冲击波开始，引起了近十年或者说十多年对诸多语言问题的反思和探讨。这一波浪潮还没退去，又来了网络语言冲击波，这一波较前一波来得更加迅猛，引起争论的声势也更为浩大，它是近十几年对语言本质、语言规范、语言教学等问题争论的总合和汇聚。

陈晓宁：促成大讨论还有其他原因。两个大的世纪的交替，就像两个大板块的碰撞，碰撞就是一场激烈的交锋。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浮出冰面。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世纪之交似乎更容易出惊世骇俗之言。世纪之交是一个阶段的开始，也是一个阶段的小结，很容易产生“温故知新”的冲动。世纪之交中国语言问题的大讨论，是对十几年来中国语言问题的梳理，更是在此基础上的前瞻。

应用语言学自身的发展也是这场语言问题大讨论的重要动因。

一百多年来，应用语言学一直在苦苦寻求与本体语言学高层次上的结合，在寻求的路上摇摇摆摆地前进。不少应用语言学者认为交际是第一原则，在交际面前，顺者昌，逆者衰，概莫能外。世纪之交的语言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和繁荣，也使这条检验标准面临新的考验。

学者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的发挥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政治专制，学者和政府相峙对立；政治温和，两者和平相处；政治民主，学者和政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辅相成。伴随着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与政府越来越亲密的接触，宽松民主的氛围，为学者们释放才华搭建了舞台。在钢筋水泥构筑的现代化建筑里，知识分子们的研究工作更多地趋向独立。而治学严谨、心忧天下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他们渴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惠及家国天下。如何体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成为世纪之交学界关注的问题。这场语言问题的热烈讨论，正体现出语言学家和语言学者们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的责任感。这场大讨论还是锻炼队伍的好战场，想成为世界性的学者，想学贯中西，首先要有宽广的胸怀。

语言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人人都可以参与语言问题的讨论，这使得大讨论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2002年10月10日《北京青年报》载文《六环路11座桥征名》，文中说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参加征名活动。《北京青年报》去年还开辟了一个专栏《文明就差这一点》，文配图，很多内容涉及语言文字。这些活动有意无意地为大讨论培育了肥沃的群众土壤。当然，我们要谨防此类活动模式化和形式化。

於春：非语言学界的人也很关注语言动态。我采访过一个广告人，采访结束后闲聊中，她和我提到纯洁语言的问题，说现在的人太不像话，什么词都说，汉语都乱七八糟了。她还说到法国捍卫法语的纯洁性，俄罗斯准备立法在官方语言中禁止外来语等等。对

于她说的纯洁语言的观点我不赞成，交流了意见后她也表示对语言问题的了解更全面了。还有一次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通常咱们把汉字分为象形、会意、形声、指事、假借、转注六种，但是电视中的嘉宾根据自己的认识总结为象形、象音、象事、象征四种，说得生动有趣，挺有意思。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很多人都在关心语言动态，关注语言上的一些热点问题，这为我们的大讨论准备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于根元：为什么这场大讨论这个时候出现在中国？是有不同意见，而且说出来。原因可以说有这么几条。一是语言是大家关心的，大家都可以讨论的。二是我们有的语言学家这些年辩证法学得好了些，思考了新的问题，例如关于度的认识，中介的认识，规范就是服务的认识。所以这场讨论是在进步的，不是混乱的。三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群的由于利益不同而认识不同。四是人群对语言学的认识不同。五是我们以前的讨论可能都有些夹生，还有我们有些工作没有做好，一刀切，跟风，说过头话，有些问题研究不够。六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人群同很多方面接触多了，思路打开了。七是有了比较好的气氛和比较好的讨论的工具与方式。

尚春光：语言的发展、语言学学科的相对成熟都促成人们对问题的反思，因此，世纪之交的大论争某种程度上是语言学学科发展进步的标志。正如事物往往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水平之后才会暴露出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必定推动事物的进一步发展。

贾磊：我记得于老师曾经把语言比作立交桥，它是具有不同层次，四通八达的。既然说它是立交桥，那么不同出入口的人们要到达的目的地就有所不同，所以在交叉路口上必然会有矛盾产生；实际当中，不同的人使用语言要实现的目标也不同，在运用中就会有不同的情况发生，这必然也会产生矛盾，关于语言的论战就在所难免。在世纪之交这个问题变得尤为突出，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

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语言这座立交桥变得更加纵横交错，作为文化、知识、经济、历史等各种信息的载体，它要承载的负荷越来越多，出现的道路分支也越来越多，问题就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

陈晓宁：任何一种现象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时空交错的研究，就是研究特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关系，研究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语言问题大讨论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中西文化大讨论的一部分。我们认为，文化交流中的平等交融能够实现，语言交流中的平等交融也能够实现。互相学习、互相尊重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思想渊远流长：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称自己为孔子弟子；康熙不仅自己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还让八旗子弟们学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学术领袖徐光启、顾炎武等人的家中，都藏有西洋书籍；民主、共和、分权、平等、自由一类的原则已经出现在清末的律法条文上。在西方，路易十四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热”遍及欧洲；中国的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不仅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还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文化的交流依靠并推进了语言文字的交流，各种语言中的外来词记录下了东西方的交流史，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活化石。

赵俐：语言观是根本。语言是交际的，动态是它的本质。因此，要生存、发展，就得交换能量，就得吸收一切先进的因素，包括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外语，只要在语言传意的准确、生动、品位三方面都比较好，促进了语言生活的丰富和发展，就可以吸收。白话文运动中，钱玄同都认为：“非用方言不能传神，不但方言就是外来语也可采用。”（《尝试集序》，《新青年》第4卷2号，转引自《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46页，同上）语言原本

就是为不同层次、不同语境中的语言交际服务的。关于外来词的写法，那时候也有争论。孙国璋提出：外来语“写在哪一种文字中，就从哪一种文字写去”（《关于“论 Esperanto 的通信”，《新青年》第 4 卷第 4 号，转引同上），他否定原文、字母的写法。其实，阿拉伯数字我们都纳入了大汉语系统，用得如此顺手、顺眼，字母词又有何不可？语言观先要有所调整，具体的写法、读法、词典排序等问题都可以在实践中再摸索、再讨论。

于根元：2001 年 6 月 6 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继续奋斗》。对 1951 年的社论全盘肯定。1951 年的社论说的纯洁，是说不要有不规范的情况。这篇社论有历史的功绩，也有历史的过错。一是对语言现象判断过早过严。二是形成了规范就是匡谬正俗的倾向。三是错误地提出毛泽东、鲁迅的语言有“一字不易”的特点。四是错误地提出纯洁语言的口号。

还有一个纯洁。2001 年 5 月 5 日《光明日报》《法国捍卫法语纯洁性》。6 月 28 日网上央视新闻《俄罗斯将立法保护本国语言》：“……最近俄罗斯政府就准备通过立法来净化本国的语言。”“为了净化俄语，俄罗斯国家杜马现在正拟订有关法律条文；这些法律主要规定，官方用语中不许带有外来词……”

2002 年 8 月 27 日，国家语委语用司召开了关于社会语言热点问题座谈会，会上就有不同意见。《文汇报》第二天的报道《新词语混乱不堪还是生动活泼》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认为，现在中国文字的混乱几经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了。大量非规范的外来语、英语缩写的直接使用、像‘菜鸟’、‘大虾’等网络语言、像‘绝代佳人’之类的新人类自己创造的词语，已经使不少文章出现了令人读不懂的情况，有些更会引出歧义，影响我们的理解。会上有人还对“克隆、纳米、的士”提出批评。肖复兴、敬一丹有不同的意见。我也发了言。新浪网和北京电视台对我们三个的发言比较感兴趣，2002 年 8 月 31 日请我们三个做客新浪网，跟网

友主要讨论网络语言问题。这次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20 世纪初白话文运动和 30 年代大众语运动，从文学界开始，然后才是语言学家唱主角。这几年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也是如此。我觉得其中有规律，就是文学界敏感，语言问题的深入解决靠语言学家出面。新浪网的这次活动是语言学家、媒体重要人物和文学家的联手，这是社会的发展，也是媒体和文学界对语言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专业化的水平。

徐红燕：外来词语（特别是英语）大量进入本国语言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反应，如法国、俄国、日本、新加坡、冰岛等国家都先后提出了捍卫语言和文化遗产的口号。这里特别提出的是冰岛的情况：由于 80% 以上的电视节目来自大西洋彼岸，已经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冰岛，为了不使自己被盎格鲁撒克逊和欧陆文化“吞没”，努力保卫本国文化和语言。四十多个语言协会常年不懈地要创造属于冰岛语自己的新词，摈弃了所有希腊文、拉丁文或英文字源，直接从属于冰岛部分的古斯基的那维亚语里取材，而这个语言可是 1000 年来都未受外来语的影响。可是，另一方面，冰岛的急速现代化也连带地使得新词汇的创造异常兴盛，每年都有数千个新词出现。

现在人们总爱将国外捍卫语言文字纯洁的现象和我国的语言现象结合起来谈，其实不同国家语言有不同的内部规律和特征，不同国家还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人文环境，所以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陈晓宁：可能是我们不少人的文化心理长期处于弱势的原因吧，似乎习惯了用别人的东西来解释自己，按别人的好恶来调整自己。对一个人来说，自醒是很重要的品质，对一个国家来说，自醒也是很重要的品质。自醒是要看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会在当下的时空点看待自己，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自醒是自己给自己下定义，而不要让别人给我们下定义或者被别人的

定义锁住了手脚。

在世界地球村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世纪之交的时刻，对外来词的产生发展应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全球的眼光来看问题。我们经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其实，辩证地看，世界的东西更应该被民族吸收，吸收得好了，就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赵俐：我们不赞同纯洁语言的说法，是因为局部的不规范可以变成规范；但不纯洁，是整体的，不可能变得纯洁。而且所谓“不纯洁”，一部分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不规范现象，我们要规范，但不可能消除不纯洁；还有一部分人说的所谓“不纯”可能是新现象，甚至是好现象，比如网络语言、新词新语、字母词、外来词中的一些新的好的语言等等。如果全部一棍子打死，是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也不利于语言生活的丰富。

张彤：我赞成在交际中检验的观点。在我们看待字母词和外来词的时候不妨参考一下其他语言的发展历史。英语是现在生命力比较强的语言，古英语是在日耳曼语和挪威语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的诺曼征服和文艺复兴又使英语中融入了大量的法语和意大利语，在英帝国与世界各种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又吸收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汉语等。例如英语中的 china（瓷）、silk（丝）、kowitz（叩头）、litchi（荔枝）就是汉语译音词，正规的英文词典中都有词条 Confucian 或 Confucius（“孔子的”或“孔子”）。可见英语是个大杂烩，而就是这样一种不纯洁的语言却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当初的日不落帝国把英语带到了她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后来居上的美国又以经济的强势巩固了英语的强势地位。所以首先我认为语言的生命力不在于它纯洁与否，而在于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占强势。

其次，汉语的语言文化传统和积淀与英语有所不同。英语是在吸收其他语言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语言的，汉语则是具有自己五千

年相对独立的、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积累，汉语中的外来译音词比较多的是近百年才开始出现的，如“布尔什维克、沙发、沙龙、咖啡、摩托、雷达、摩丝、克隆、纳米”等；字母词的出现时间就更短了，也就十多年，如“WTO, APEC, MBA, CEO, CD, VCD, DVD, CDMA”等。不到一个世纪的外来语和字母词与五千年的语言文化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就像一条小河注入大海，大海依旧是咸的，不会因为一条小河而改变它的味道。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不断提升，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对外汉语空前火爆，汉语言文化的传播范围将会更广，我们拿给老外的正是我们传统和现代语言文化的精华。所以我认为汉语发展的后劲会很足，不会因为少量的外来词和字母词而改变其主流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看待语言的发展应该把它放到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来分析，有些问题的实质不是语言不规范了，而是科技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人们的知识结构跟不上了。我记得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计算机刚在国内出现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汉字要走字母化的道路，要与国际接轨适应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当时字母化道路对方块字的冲击要远比现在汉语中出现的外来词、字母词、网络语言的冲击要可怕的多，结果如何呢？最终还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互联网上的中文，大大拓展了汉语的传播途径。有人认为外来词和字母词使得人们读不懂汉语了，例如“基因、纳米、蓝牙、CDMA”等。如果说“纳米冰箱”很多人不懂，要怪“纳米”这个词，那么“数字/数码冰箱”很多人不懂，要怪谁呢？“数字/数码”总不是外来词了吧？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必然会在语言上有所反映，会有一些新词出现，原有的词也会具有新的意义，这也正是语言词汇发展的途径。科技进步是以加速度进行的，知识结构的更新总是落后于科技发展的，我们不该把这种结果片面地归咎于语言，认为语言不纯洁了或不规范了。我们

应该辩证地看待科学技术与语言的发展关系。

事实上我国对外来词的汉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和我们的邻居日本比起来我们对大量的外来词都进行过加工，例如“收音机、照相机、超级市场、公共汽车”等等许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词日语中都是直接采用译音的。日语的构成也是比较杂的，它包括和语、汉语和外来词。和语是日本大和民族自古传承下来的语言，汉语是在唐朝时期日本向中国借鉴的，外来词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量向西方借鉴的。虽然日语中外来语占了较大比重，和语并没有萎缩或消失，而且和语以外的部分人们仍然认为它是日语，尽管他们的汉语部分使用汉字，但由于发音和意义已不同于汉语，所以它们还是日语。在日语当中外来词通常用片假名书写，以区别于平假名所书写的和语和汉语，让人一目了然知道哪些是外来词。这一点是不是也可供我们参考一下。

于根元：9月26日新浪网对我电话专访，第二三天出来，标题是《语言地位靠经济撑腰》，提的问题有：

新浪观察：前不久影星巩俐被媒体爆出在威尼斯电影节因其不会说英文而使颁奖典礼出现冷场而受到广泛争议和批评。之前也有一些名流因语言问题在公众场合出现的尴尬场面。而另一方面是国内全民性的学英语高潮，不论职业，不论年龄，全都拿着英文在啃，关于这些问题您怎么看？

新浪观察：许多人批评现在年轻一代的汉语水平在整体大幅下降，您怎么看。

新浪观察：我们注意到在一些公共场所，如公共卫生间，现在一般是标识加英文，很少有汉字出现，有人说是国际化的需要。而在韩国一些国家，公共标识都用自己国家文字，不用英文，而这些国家的经济比我们发达，国际化程度也比我们高，您怎么看？

新浪观察：许多人士指出“汉语严重被英文挤压，地位在下降，不日将被取代”，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新浪观察：汉语的地位之争，有人已把它上升为“爱国主义”您怎么看？

网友参加讨论的特别多，连续到现在近 20 天了，据说至少有了五十多页。这又是一个层次的大讨论。关于这个问题，还要说几点。一是，语言地位靠综合国力撑腰的说法比靠经济撑腰的说法来得好。二、语言地位的变化不是跟经济地位的变化完全同步的。三是有人说将来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我不同意。四是有人说我们经济地位上去了之后，人家学汉语，我们就不怎么要学人家的语言了，这也是误解。以后，不仅仅是语言，别的方面我们还是学。学得好才强大，强大了继续学才更强大。强大时候的主动学，才是高层次的学。

贾磊：关于中国人学习英语的问题，从网友们的讨论来看，大部分的人是同意于老师“语言地位靠经济撑腰”的观点的，只是一部分人对大学英语四、六级的考试制度意见较大，所以关于外语的讨论，大部分人是会达成一致的。而因广告语、网络语言、外来语等引起的社会争论却愈演愈烈，我觉得可以把它们看作不同形式的新词新语，大家对这些新语言的看法分歧很大。我们最近在学习普通语言学，里面提到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具有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而这些引起争议的语言有相对任意性的特征，所以它的造词既有逻辑上的意义，又有形式上的新颖。因此，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论战也就此开始，而随着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运用相对任意性制造的语言也会越来越多，论战也会持续下去。

于根元：大讨论的大，是指涉及的面大，参加的人多，声势大，问题尖锐，有时候是针锋相对。网络语言是大讨论的催化剂。批评的话有：误导孩子、破坏文化、破坏语言规范和纯洁、黑话、不懂、不对、洋化、怎么能编这种词典呢？大多是语言学界之外的

专家说的。语言学界的情况有了进步。群众的情况一直比较好。非语言学界的情况也不同。2001年1月~6月,参加讨论的媒体有三百多家。主要是围绕我们要出版的《中国网络语言词典》进行的。我在《网络语言概说》“前言”里说:“我们认为网络语言的冲击波是这场大讨论或者大论战的催化剂,因为当前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已经涉及了语言功能、语言规范、语言教学、新词新语、广告语言、外语词的使用、词典编纂等问题。网络语言的冲击波,或者说,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争论,是近十几年来新词新语冲击波的发展,或者说,关于网络语言的讨论,是近十几年来新词新语、语言规范问题、语言教学等问题讨论、争论的汇合。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它的出现还引起了我们对四个媒体的有关问题的总的反思,也引起了我们对语言传播学说的有关问题的总的反思。”

陈晓宁:矛盾越是尖锐、问题越是关键,才越能检验出个人和队伍的素质。我曾经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先生探讨过类似的问题,他说,机关里按部就班的工作很难检验出一个人水平的高下,只有在突发事件面前,才能对一个人处理问题的能力做出判断。面对有时候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大讨论,我们的态度和应对的方式方法,我们的看法和观点,都在接受检验。面对中肯善意的意见,我们不仅有识别的眼光,还要拿来为我所用;面对偏见和误解,我们要有神闲气定的胸怀,善于坚持;面对逆耳忠言,我们更要心怀感谢,感谢那些信任我们,不吝赐教赐“宝”的朋友。

赵俐:今年8月,我和学院的三位老师一起到香港为香港法定语文事务署的公务员讲授普通话课程。我在关于普通话的新词新语专题讲座中谈到语言观的更新与开放,听课的公务员朋友很感兴趣。但也有搞语文工作的人提出他们在普通话并不太标准的香港做工作,更需要规范的标准。还有教授普通话的老师提出眼下社会用语中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我非常理解他们。我们提出新的规范观,是有针对性的,过去人们看到不好的语言现象批评指责的多,以为

规范就是挑毛病，而发现好的语言现象加以引导和鼓励的太少。当然，我们研究中是需要研究新词新语、外来语和网络语言的规范的基本原则的，不能偏废。

于根元：这场大讨论的性质是关于语言观的大讨论。主要是怎样认识语言：语言是什么？我们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由动态和稳态两个部分组成。规范就是服务，服务包括引导。

刘艳春：在这个过程中，就争论本质而言是对语言本质的不同认识外化为对语言观问题的大讨论，这其中当然也必然涉及到对其他的更深层次的东西的评价。讨论的焦点主要有，关于语言、言语区分问题的不同意见，对广告语、外来词的探讨，对语言纯洁问题的论争，对网络语言的大讨论。有的是断断续续进行的，有的则是一直在讨论的。而后三者实际上是贯穿着对语言规范问题不同认识的论辩。

语言观问题的讨论表面上集中在 1994 ~ 1996 年的探讨上，其实从新词新语开始，到 1994 ~ 1996 年，再到后来语言哲学对话，再到现在网络语言大论战，实质上都是对语言观的探讨，对语言本质，对语言规范不同认识的交锋。

尚春光：这场世纪之交的关于语言问题的大论争，集中到一点实际上是不同的人面对新的语言形式和一些看起来和我们惯用语言形式不同的异质因素如字母词、外来词等的出现的看法。对一种语言现象的不同态度，更深层次体现为不同的语言观，语言观是世界观在语言问题上的一种映射，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不同的语言观，由此，语言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是不同语言观的一种交锋，更是不同世界观、方法论的交锋，是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各种物质层面以及精神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在语言层面上的体现。

赵俐：语言观受哲学思想影响，背后可能是宇宙观，同时又直接影响语言学理论的建设。从我国语言学的发展来看，重视国外

的理论，引进较多。其实，我们的语言学理论有自己的历史和特色，比如东方哲学的思想和表述特色。因此我们最应该珍惜的是自己脚下的实际，要挖掘它，研究它，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看《语言哲学对话》（于根元等著，语文出版社，1999）里“同海外兵团几位朋友的对话”中说到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用新的语料来检验或推翻或发展现有理论，而不是仅仅用新理论去指导实践。这点好，我们就学习。现在我们遇上时机了，大讨论会为我们提供很多最鲜活的语料。

於春：需要避免两种极端状况：要么以纯而又纯为爱国，要么照搬国外的一套。这都不符合实事求是，不是辩证的态度和方法。咱们国家强大了，外国人会来学我们的语言、文化和其他，但是，正因为强大了，我们也会更多地学习别的语言文化等等来丰富发展我们自己。历史上我国强盛的时候总是和外界交往多的时候，清朝日渐衰落才闭关锁国。目前，我国正处于扩大改革开放、迈向世界的时期，这时候的学习不是被动接受不是低层次学习而是主动吸收向高层次走。有容乃大，有容乃丰。

陈晓宁：只有胸怀宽广才能海纳百川。印度作家们说，他们也用英语写作，但用的既不是美式也不是英式英语，他们用的是印度英语。泰戈尔用这样的印度英语抱回了诺贝尔奖。我最初和韩国学生交流的时候，尽量不提及韩语中大量的词是从汉语借去的之类的话题。但后来我发现，韩国人以此为荣。他们说：“来源是你们的，但现在是我们的。”他们很自豪。我的一个学生甚至帮助我整理了韩语向汉语借词的资料。

海纳百川，是汉语走向世界的姿态，也是汉语创造之美的源泉和动力。美丽的汉语将在走向世界的路途中，吐故纳新、扬长避短、兼收并蓄、活力四射。汉语的美丽将在走向世界中延续。

李亚明：大家都提到语言观，使我想起了萨丕尔的一句话——“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语言的背后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我

想，可能是包含了心理层、制度层和物质层等各层次、各方面的文化。世纪之交的语言问题大讨论，实际上是一场文化问题大讨论。这一点与 20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的文白之争等有相似之处。比如，文化的全球化、多元化和多极化，决定了人们对接受、认同和使用外来语的宽容态度。既然我们无法对文化进行硬性的规范，那么对语言的规范也必然是相对有弹性的，是一种引导（当然不是迎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规范是前瞻的，而不是滞后的；是从认识回到实践的第二层次，而不是从实践上升到认识的第一层次；是全社会、各行业、各学界、各学科的事情，而不只是语言学工作者的事情。比如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对几十个学科的名词进行审定、公布和协调统一，其中许多名词是外来的，或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只要合理，也不妨借他山之玉。所以，语言学工作者在开展这场讨论的时候，应该具有宽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和宽容的心态。

于根元：关于语言问题的大讨论或者大论战，我们要接受“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上个世纪 30 年代大众语运动的两个教训，一是态度要好，尽量多团结人。大同会有小异，大异会有小同。二是要重在建设，尤其是理论建设。要有实绩。要积极投入。这是我们语言学为世界做贡献的大好时机。是发展社会语言生活、发展语言学术、锻炼语言学术队伍的大好时机。我们研究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及理论，研究历史主要是把握现在和未来，研究理论主要是建设理论。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於春：讨论是好事，能听到和我们观点不同的甚至难听的话更是好事，可以让我们研究这些意见的前因后果，反省完善我们的工作。其实，我们的语言生活中有纯洁语言的说法和追认观也是好事，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欢迎他们说理。就像原始森林一样，正是因为物种丰富，相克相生，相伴相生，所以森林才繁茂，如果只有一两种或几种动植物，都是同科同属，别说森林繁茂，恐